

神秘文化在构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刘俊男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虽有不科学的一面,但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神徽是凝聚人心的旗帜,促进了民族的形成;首领利用神秘文化提高自身的地位,以顺利建立其统治;君主利用神秘文化有效地实行统治;臣子利用神秘文化来匡正天下;普通人利用神秘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意愿。

关键词: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和谐社会

神秘文化指人们利用人力以外的力量去支配人的活动而创造的文化。它利用鬼、神、天、地等非人力因素,通过占卜、占卦、占梦、符咒等手段来实现文化制造者的意志。君主、圣贤、普通人皆可利用它来达到缓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神秘文化有不科学的一面,有时还制造一些混乱与浪费,如唐朝迎佛进京、帝王封禅等事例。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神秘文化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以为神秘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 神徽是凝聚人心的旗帜,促进了民族的形成

在远古时代,每个部落几乎都有神徽,这种神徽在凝聚人心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使人们团结在这个神徽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民族。在中国原始社会出现过多种神徽,而以湖南怀化高庙等地区出现的 7800~6800 年前的凤凰纹、獠牙兽面纹(龙纹)及八角纹(如图 1,其中 3、4、5 引自贺刚文章^[1])影响最大,这种类似的图案在后来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反复以类似或变体图案出现,并影响至今。中国人是龙凤的传人,可上溯至 7800 年前的湖南高庙文化。这种龙凤的神徽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首领利用神秘文化以确立其统治

在原始社会末期,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无



1、2、7:怀化高庙(T2003 ②: 12、T0913④: 45、T1015⑧: 16); 3:高庙; 4、5长沙大塘; 6:安乡汤家岗M1: 1

图 1 7800~6800 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神徽

政府向有政府转化。可是,谁来充任政府首脑?若凭身体条件,也许很多人都差不多;若以德行为尺度,又不合实际;若象动物争王一样,必然带来无穷的厮杀。在文明化进程中,首领们往往通过宗教这种神秘文化来实现其角色的转化。因此,有人将是否有宗教祭坛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童恩正在论述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时说:“在原始社会后期,宗教仪式的举办和宗教场所的兴建可以说是影响群众最方便的手段,这种凝聚力有时连生产和战争活动也难比拟。在从事以宗教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过程中,氏族的上层集团

收稿日期:2009-02-18

基金项目:湖南省 2006 年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科研项目(0607003B)

作者简介:刘俊男,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先秦秦汉史。

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 and 经常化”。^[2]

在上古史上,三代之祖皆有神秘降生的传说。夏禹由其父夏鲧剖腹而出,故《天问》有“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的疑问。《史记·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殷本纪》“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4]《周本纪》

陈胜起义时也用了神秘手段。《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至汉刘邦,又有其母刘媪梦感蛟龙而生子之说,还有“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之说,其“居上常有云气”,如此等等,使民众畏惧而纷纷归附他。^[5]《汉高祖本纪》

可见,古代贤人为了当上首领,大都利用过神秘文化,这样很轻松地就使民众归附其麾下,避免了为争夺位置而导致流血冲突。这种神秘文化看起来像神话,因此过去的疑古学者不相信这些“神话”人物。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历史人物,我们应充分认识和了解这些神秘文化。

三 君主利用神秘文化实施其统治

君主在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常利用神秘文化来实施其统治,这突出地表现在占卜与占卦上。占卜,商代甲骨文有充分的证据,其实质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君主犹豫不决的时候听任“卜相”来取舍;另一方面是君主意见敌不过臣子意见而采取的策略,这时,常由“王”来占问。甲骨文中常有“王占曰”的字样,用神的口吻来表达王的意志。周代则主要是占卦,共六十四卦,每卦有卦、爻辞。占卦与占卜比,带有更多理性的东西。因为卦、爻辞事先写在书上,即《周易》,这些言辞全是当时的哲理。

人们占卦,就是叫人们按《周易》上的哲理去行事。虽然有些神秘,但理性的东西增多了。

君主常常代表天帝发号施令,讨伐乱臣往往就说是执行“天罚”、“替天行道”。遇到重大活动要举行神秘的仪式以使大家统一思想。例如,传说尧禅舜、舜禅禹时都要举行“河出图,洛出书”的重大仪式。如《宋书·符瑞志》《竹书纪年》皆载:

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盖五星之精也(五老人扮装五星之精引者注)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飞为流星,上入昴(昴,西七宿之中星也,据古星野说对应地上的冀州,即王畿之州,意味着可以主持王畿之州而为天子也引者注)。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閼色授帝舜’,言虞夏当受天命。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东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神话,皆人所为,所谓出图书,皆事先写于玉璧之上,沉于河中,系之以“青绳”,然后将其慢慢拖出,以愚弄旁观的百姓,以示天之授政。这只是一仪式,同时亦表示“洪范”(洛书)之重要,故《史记》载尧禅舜、舜禅禹时都说一句:“天之历数在尔躬”的话,以嘱其按天行事,即按客观规律办事。《尚书·顾命》云:“天球、河图在东序”,可见《河图》非天所赐,它是一种天文历法工具,与“天球”一起,放在东边校舍里。后人不知“河图”“洛书”的来历,故视之如神。

王莽篡位之时,也用了类似的神秘文化手段。如《汉书·王莽传》所载: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置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匱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匱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篡位时也举行了类似尧舜禹禅让之类的仪式,只是将“五老”称为“五威”。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鸞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

孟子引孔子语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4]即是说,尧舜禅让与殷代夏,周代殷是一样的。笔者以为,利用神秘的“天命”来禅让,避免了武力冲突,对社会的和谐起到重大作用。

除了占卜、占卦、神秘仪式之外,还有占梦、符咒、祭祀等神秘文化手段。例如,据《史记·殷本纪》,传说以一介刑徒(“胥靡”)的身份,通过商王武丁的占梦一跃成为商代的宰相,并使商代达到鼎盛。周文王则通过占卦,得到姜尚,并拜为国师,使周朝得以灭商。^[5]这两件事,几千年来一直传为佳话。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提拔方式,当是为了避免在官员提拔中王室与贵族间的不和谐声音。在那个时代,提拔官员都得讲出身、讲等级,若按正常的途径去选拔官吏,像传说、姜尚这些地位低下的才人就难得选上,武丁和周文王利用这种神秘的方法提拔官员很好地化解了这种矛盾,使社会变得和谐。中国古代史中,这类神秘文化的史事不胜枚举。

四 臣子利用神秘文化来匡正天下

臣子也可利用神秘文化来制约君主。如:管子用它阻止齐桓公封禅,董仲舒制造“天人感应”学说来制约君主,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记·封禅书》载: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虞羲封泰山,禅云云……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

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邇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这件事例生动地说明,管仲巧妙利用凤凰、比目鱼、嘉谷等神秘之物,成功地阻止了齐桓公的封禅。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为人者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6]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7]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可见,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后世帝王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董仲舒的学术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谏君主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为构建古代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 普通人利用神秘文化来实现小范围的和谐

普通人也常利用神秘文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孔子虽是圣人,但在日常行为中,也同普通人一样利用过神秘文化。如:“孔子周游列国,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罹难,宁斗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

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3]孔子世家

孔子历来要求学生讲信用,可是这次他本人不讲信用,不守盟约,遭到学生的质疑。孔子便拿“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辩称在要挟的背景下订的盟约,神是不认可的。

方术之士,常以符咒来治病。这种符咒,实质就是“神秘文化”,但起作用的不是符咒,而是他采取的药物或心理措施。过去的匠人临死时要举行一个“倒教”的仪式,将其真功夫传给弟子。这在外人看来,十分神秘。众弟子更感神奇。师傅到底要将“教”倒给谁?这个“教”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没有学过艺的人很难知晓。

据笔者调查分析,方术之士的符咒只不过是防止外人随便学去,抢走他们“饭碗”的一种假托方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他们采取的一些实际措施,或精神方面的,或物质方面的。农村方术之士及匠人们用“倒教”、符咒等办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周围的和谐,避免了与别人的职业争夺。有些匠人带了很多徒弟,而“教”只能倒给一个人,就像帝位只能传给一位太子一样,谁来受教,就决定了谁拥有嫡传。师傅用这种方法能使徒弟长久尊奉师傅,有效地维护了师道尊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乃至现代中国,神秘文化比比皆是,不能简单地以“迷信”、“神话”去否定其历史存在,而应当细心研究其存在的原因及其复杂作用。神秘文化尽管有不科学、欺骗的一面,但却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信仰宗教

的国家,神秘文化仍不可一概否定,应具体分析。西方国家信宗教的人很多,宗教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要素。例如,西方人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并宣誓夫妻俩白头偕老,这种婚礼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对夫妻和睦具有永久的影响力。西方信教的人虽然很多,而他们的科技也很发达,看来,科技与神秘文化也是可以并存的。神秘文化在当今固然不会再发生那样大的影响;然而,神秘文化在古代维系社会和谐的成功经验促使我们思考新时代的新办法。笔者以为,上文中所列神秘文化的种种表现归结为一点,就是帝王、圣贤、师傅们利用了受众的心理,种种办法都是要使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施主的意志,最终目的是要“得民心”,达到社会的和谐。我们应充分研究这种神秘文化,并思考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所应采取的新办法。

参考文献:

- [1] 贺刚. 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 [C].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6: 282 - 287.
- [2] 童恩正. 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 [C].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6: 312
- [3]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4] 孟子. 孟子:万章上 [M]. 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1986.
- [5] 吕尚. 白话六韬:文师 [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 [6]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 [7] 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责任编辑:骆晓会)

ABSTRACTS

(1) CHEN Du-xiu's Pondera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ode of Soviet Russia

LUO Xiao-hui (004)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CHEN Du-xiu disapproved Comintern's guiding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mode of Russian revolution. He advocated that a backward country develop Capitalism first to construct Socialism and criticized Stalin's dictatorship and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CHEN's advocacy and criticism, most of which was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shows his good insight, precise prediction and conscience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his tragedy.

Key words: CHEN Du-xiu; mode of Soviet Russia; Socialism; democracy; Stalin

(2) On the Role of Mysteriou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L U Jun-na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ough not scientific, the mysteriou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God emblem acted as the banner to unite the peoples,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 tribe leader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improve their own status so as to successfully establish their sovereignty; king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rule the people; the subjects of the kings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used the mysterious culture to achieve their wishes.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the mysterious culture; harmonious society

(3) Study on Imperial Clans' Illegal Leave from Fief and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LEI Bing-y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Yong Le period in the Ming Dynasty, royal clanmen's status dramatically chang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mperial clans were not allowed to get away from their domain and not permitted to get engaged in industries of the four callings, and they became a sitting-year-old parasitic class who just wasted their salaries. There were also some harsh bans on their memorial presentation. But the rules were always in vain. Especially after Zheng De period, the Ming Dynasty was perplexed by increasingly worse problems of the imperial clan's salary, illegal leave from their fiefs and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

Key words: imperial clan and vassal state king; ban; illegal leave from fief; law-breaking memorial presentation